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219-229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111066

Hans汉斯

哲思的译渡与诗意的再生

——《我与地坛》葛凯伦、陈泽平英译本研究

谈　莉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7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9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1日

摘　要

史铁生的长篇哲思抒情散文《我与地坛》是中国当代散文的经典之作，其英译本的翻译质量直接关系到这部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葛凯伦(Karen Gernant)与陈泽平合作翻译的英译本收录于《El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一书，是迄今最完整的英译本之一。本文从文化负载词的处理、句式结构的转换、意象系统的传递和语言风格的再现四个维度，考察该译本的策略选择及得失。研究发现，译本整体上采用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策略：文化负载词以意译为主、直译为辅；句式转换体现出由“主题凸显”向“主语凸显”的结构重组；哲思气质得到成功再现，但口语化风格的转译存在一定程度的消解。

关键词

《我与地坛》，英译研究，葛凯伦，散文翻译，翻译策略

Translating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 Regenerating Poetic Quality

—A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o Yu Ditan* (I and the Temple of Earth) by Karen Gernant and Chen Zeping

Li T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September 27, 2026; accepted: October 29,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1, 2026

Abstract

***Wo Yu Ditan*, Shi Tiesheng's lengthy philosophical and lyrical essay, is a classic of contemporary**

文章引用: 谈莉. 哲思的译渡与诗意的再生[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1): 219-229.
DOI: 10.12677/ml.2026.14111066

Chinese prose, and the quality of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bears directly on its reception abroad. The English version jointly produced by Karen Gernant and Chen Zeping, collected in El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is one of the most complet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work to date. Examining it from four dimensions—culture-loaded words, sentence structures, the image system, and linguistic style—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translation combines domestication with foreignization, with free translation supplemented by literal translation in handling culture-loaded words, and a structural reorganization from topic-prominent to subject-prominent patterns in sentence transformation, successfully reproducing the philosophical temperament of the original while attenuating its colloquial style to a certain degree.

Keywords

***Wo Yu Ditan* (I and the Temple of Earth), English Translation Studies, Karen Gernant, Prose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史铁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独特而重要的作家。1951 年生于北京，1969 年赴延安插队，1972 年因病瘫痪，此后终身与轮椅为伴，始终以写作叩问生命、寻求救赎，形成了独特而超脱的生命意识。1991 年 1 月，史铁生在《上海文学》发表长篇哲思抒情散文《我与地坛》[1]，这部作品迅速成为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评价道：“《我与地坛》是一篇在当代非常难得的、值得人反复吟读的优美散文，作家史铁生以极朴素动人的语言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所思。全部讲述所围绕的核心是有关生命本身的问题：人该怎样来看待生命[2]。”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国当代文学的外译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外译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3]。史铁生的作品已被译成日、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然而，相较于史铁生在中文世界的巨大影响力，其作品英译本的学术研究尚显不足。《我与地坛》英译本的翻译质量直接关系到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效果，对这一译本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2. 研究现状

当前学界对《我与地坛》的翻译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研究语种以维译和俄译为主，对英译本的系统性研究较为匮乏：景治强、张雪琪对《我与地坛》维译本中的明喻翻译技巧进行了专题研究[4]。其次，现有的英译研究主要以翻译实践报告的形式呈现，罗浩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我与地坛〉翻译的实践报告》中，以归化翻译理念为指导完成了全文翻译实践，并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归纳[5]，但该研究属于译者自身的实践报告，而非对已有译本的批评性研究。

1.3. 研究问题与方法

本文拟回答以下核心问题：葛凯伦、陈泽平译本采用了何种翻译策略来处理《我与地坛》的文化负

载词、句式结构、意象系统和语言风格？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原文文学特质的有效传递？译本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其原因何在？

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文本细读法和对比分析法：通过原文与译文的对照阅读，从词汇、句法、意象和风格四个层面提取典型案例，并以归化与异化理论、文学文体学为核心分析框架展开定性分析。在具体操作中，每个案例的分析均落脚于其如何印证、挑战或丰富了上述理论的内涵，使理论阐释与文本分析相互印证，避免二者的脱节。

1.4. 研究意义

本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意义。在学术层面，有助于填补《我与地坛》英译本系统性研究的空白，丰富中国当代散文英译研究的案例库；在实践层面，可以为中国文学“走出去”背景下的散文外译实践提供参考；在跨文化传播层面，有助于思考如何在翻译中平衡文化特质的保留与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

2. 文献综述

2.1. 史铁生与《我与地坛》研究综述

国内学界对史铁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生命哲学研究、创作风格研究和社会文化视角研究。

在生命哲学研究方面，史铁生被视为中国当代最具哲学深度的作家之一，他以自身残疾的生命体验为起点，将个体的苦难升华为对普世生命意义的叩问。赵勇在《〈我与地坛〉面面观》中指出，这部散文“直接与作者的遭遇与疾病相关[6]”，不了解作者的情况就无法很好地理解这篇作品。

在创作风格研究方面，学者们着重分析了《我与地坛》的文学语言形式及其叙事策略。屈伟忠在《〈我与地坛〉的文学语言形式及其意蕴》中指出，史铁生独特的文学语言组织形式体现在主被动颠倒句式蕴含的生命体悟、人称他者化背后的清醒抒情以及循环往复的节奏构成三个方面[7]。

2.2. 中国当代散文英译研究综述

散文英译是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中的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与小说和诗歌翻译相比，散文翻译的学术关注度明显偏低，散文英译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8]。

在理论视角方面，生态翻译学为散文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主张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考察译者的适应性选择[9]，学者们据此对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的翻译实践进行了分析。在美学取向上，有学者以《故都的秋》的英译为例，从功能对等理论视角考察散文翻译如何再现原文的艺术意境与风格神韵[10]；也有学者借助变译理论的七种变通手段分析译者的灵活处理[11]；还有学者依据刘宓庆的翻译美学理论，强调让目标语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相同的美的感受[12]。

在翻译策略方面，压缩策略被认为是散文英译中常用的手段。译者往往在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层面对原文信息进行压缩，在词汇层面多用隐含修饰词和注释性增添，句子层面多用主次结构调整和聚焦式增添，语篇层面多用添加逻辑关系连接词等压缩技巧[8]。英汉思维差异也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汉语是主题凸显的语言，句子结构往往以话题为中心；而英语是主语凸显的语言，要求每个句子必须有明确的主语和完整的语法结构[13]。

在归化与异化策略的选择上，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中指出，归化策略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语言文化规范，让译者趋于“隐形”；异化策略则刻意保留源语的语言文化特征，使读者感受到“异域”的存在[14]。归化译文虽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但若罔顾源语语言形式，容易造成某种程度的“变调”；异化视角下的翻译实践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源语的文化特质。这一辩证关系正是本文分析葛凯伦、陈泽平译本策略选择的出发点。

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分析《我与地坛》英译本提供了理论参照和方法借鉴，但现有散文英译研究以张培基的译作为主要语料，对其他译者(尤其是中外合作译者)的译本关注不足，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切入点。

2.3. 译者研究：葛凯伦与陈泽平

理解译者的背景与翻译理念，对于深入分析译本具有重要意义。葛凯伦(Karen Gernant)是美国南俄勒冈大学中国史荣休教授；陈泽平是福建师范大学中文语言学教授。两人合作翻译了二十多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累计出版译作十二部，共六十六篇[15]。

葛凯伦和陈泽平的合作模式属于典型的“中外合译”模式——西方母语译者与中文语言学家携手合作，这一模式在当代中国文学英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 2024 年 1 月福建省翻译协会举办的讲座中，葛凯伦阐述了她的文学翻译理念：翻译需要“将原文作品中的情绪、内涵、氛围、节奏等信息传递给译文读者”，同时“注意中英文本间的细微差异，找准词语搭配，避免逐字翻译”，并强调要“多听取母语使用者的意见或建议，对译文进行灵活处理[15]”。这些理念体现了译者注重可读性与接受效果的翻译取向。

两位译者的学术背景——一位是中国史学者，一位是中文语言学教授——使他们对史铁生文本中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语言特征具有较为深入的理解。这种学者型译者的身份，对于翻译《我与地坛》这样一部既蕴含深厚文化底蕴又富有哲学思辨色彩的散文作品，具有天然的优势。

2.4. 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本文的创新点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文献综述可以发现，当前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我与地坛》英译本的系统性研究几乎空白，现有相关研究或聚焦于维译、俄译等其他语种，或属于译者自述式的翻译实践报告。其二，中国当代散文英译研究在语料选择上过于集中于张培基等少数译者，对中外合译模式下的散文翻译缺乏充分关注。其三，将史铁生原文的文学研究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跨学科视角尚未得到充分展开。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尝试对葛凯伦、陈泽平《我与地坛》英译本进行系统的、多维度的翻译批评研究，将原文的文学语言特征分析与翻译策略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评估译本对中国当代散文英译实践的启示意义。

3. 理论框架

3.1. 归化与异化：策略取向的分析框架

归化与异化是翻译策略研究中最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之一。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中提出，归化是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语言文化规范、以目标读者熟悉的方式消弭源语差异的策略，其结果是译者趋于“隐形”；异化则刻意保留源语的语言文化特征，使读者感受到“异域”的存在，从而抵抗文化同化[14]。

对于《我与地坛》的翻译而言，归化与异化的取舍尤为关键。一方面，散文中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如“地坛”“宿命”等)承载着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涵，过度归化会导致文化意义的流失；另一方面，史铁生的哲思语言具有相当程度的普世性，这使得适度归化以追求跨文化传播效果成为可能。葛凯伦的翻译理念也印证了这一点：她主张在忠实于原文精神的前提下适当归化以确保可读性[15]。本文以这一理论为分析工具，重点考察译本在文化负载词与意象系统上的取舍，并追问每种取舍如何印证、挑战或丰富了韦努蒂理论的既有内涵。

3.2. 文体学视角：风格再现的分析框架

文学文体学主张，文学作品的风格并非附着于内容之上的装饰，语言组织形式本身即承载意义。申

丹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中系统论证了文体分析对翻译批评的价值：只有把握原文的文体特征，才能识别译文中“假象等值”式的风格流失，即在语义层面与原文等值、却在文体层面失落了原文语言组织形式的译文[16]。

就《我与地坛》而言，原文风格具有鲜明的双重性：既是凝练深沉的哲思语言，又是朴素自然的口语化表达。其文学语言组织形式体现在主被动颠倒句式蕴含的生命体悟、人称他者化背后的清醒抒情以及循环往复的节奏构成等方面[16]。同时，英汉两种语言在句法与篇章组织上的系统差异——汉语“主题凸显”、英语“主语凸显”[16]——决定了风格再现必然伴随着句式结构的重组。本文以文学文体学为第二重分析框架，考察译本在句式转换与语言风格再现中的得失，追问哪些文体特征被保留、哪些被弱化，以及这种保留与弱化如何印证或挑战了文体学关于风格可译性的论述。

4. 《我与地坛》英译本的多维分析

4.1.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文化负载词是《我与地坛》翻译中的核心难点，如何处理这些蕴含独特中国文化内涵的词汇，直接关系到译本的文化传递效果。

4.1.1. “地坛”的翻译与文化意蕴的传达

“地坛”是全文最核心的文化意象。地坛(Temple of Earth)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皇地祇”的场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然而，对于英语读者而言，“Temple of Earth”这一译名能否唤起相应的文化联想，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葛凯伦和陈泽平采用了直译“the Temple of Earth Park”，并在首次出现时附加了解释性信息：

原文：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

译文：In a number of my stories, I’ve referred to an antiquated park: in fact, this is the Temple of Earth Park [17].

这种“直译 + 补充说明”的方式，既保留了文化专有名词的异质性，又为英语读者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信息。译文将“古园”译为“antiquated park”，准确传达了“废弃”“荒芜”的语义内涵，但“antiquated”一词带有“陈旧过时”的贬义色彩，与原文中作者对地坛深厚而复杂的情感存在微妙的差距，提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不仅涉及指称意义的对应，更关涉情感色彩的准确传达。从归化与异化理论的角度看，这一案例印证了异化策略在保留文化专有名词异质性方面的优势，也丰富了对该理论的理解：即便采取直译，译词在目标语中的语用色彩仍可能造成情感层次的偏移，策略的成效最终取决于微观语词的精准选择。

4.1.2. 抽象哲思类词汇的翻译

《我与地坛》中充满了关于生死、命运、宿命的哲思性词汇。以“宿命”为例：

原文：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译文：I often felt this was something foreordained — as if this old park were waiting especially for me: it seemed it had been waiting for four hundred years—through all the tumultuous changes of those centuries [17].

译者将“宿命”译为“foreordained”，这一选择值得深入分析。在英语中，“foreordained”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通常指上帝预先安排好的命运；而史铁生原文中的“宿命”更接近中国传统文化中“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含蓄表达。译者使用这一具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词汇，实际上是一种归化策略——用英语读者熟悉的宗教概念来传达原文的宿命感。这一案例印证了归化策略的核心机制：以目标语文化

中功能相近的概念替换源语概念，虽提高了可读性，却使原文的文化底色被译入语的文化框架所改写，恰如韦努蒂所论，归化以译入语规范消弭了源语差异[14]。

4.1.3. 传统文化词汇的翻译

原文第一段中对地坛建筑装饰的描写集中呈现了一系列传统文化词汇：

原文：四百多年里，它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

译文：In those four hundred years, it had been denuded of the colored glazes on the eaves of its old halls, the glorious vermilion of its gates and walls had faded, the high walls had collapsed, pieces of jade inlays in its carved railings had loosened and scattered, the old cypresses surrounding the sacrificial altar had become more and more dark and serene, and everywhere wild grasses and vines flourished, spreading out contentedly and freely [17].

这一长句的翻译体现了译者对原文文采的充分尊重与再现。“琉璃”译为“colored glazes”，“朱红”译为“glorious vermilion”，“玉砌雕栏”译为“pieces of jade inlays in its carved railings”，每一处文化词汇都得到了准确的对应。特别值得肯定的是“朱红”的翻译——“vermillion”较之通俗的“red”更能传达古建筑彩绘的质感，“glorious”的添加则补足了原文“炫耀的”所传达的昔日辉煌感。这一案例印证了异化策略在文化信息传递上的价值：对于承载具体文化信息的器物类词汇，直译式的准确对应能够有效保留文化异质性，使英语读者经由译文接触原文的文化能指[14]。

然而，译文在处理句子结构时，将原文一个连绵不断的长句切分为多个并列的英语分句，虽然在语义传达上无可挑剔，但在节奏上不可避免地失落了原文一气呵成的气势。原文用一系列并列的动词短语——“剥蚀了……淡褪了……坍圮了……散落了”——营造出时间的缓慢流逝感和沧桑感，这种修辞效果在译文的句法转换中有所消解。从文体学的视角看，这一现象正是申丹所论“假象等值”的典型形态：译文在语义层面与原文等值，却在文体层面失落了原文语言组织形式所承载的节奏与气韵[16]。

4.1.4. 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的总体特征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译本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呈现出以下特征：在专有名词上采用“直译 + 补充”策略；在哲思类抽象词汇上倾向于意译，用英语中功能相近的概念进行替换；在具体的文化器物词汇上追求准确对应，并适度添加修饰词以强化表现力。整体而言，译者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采取了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以保障英语读者的可接受性为首要目标，同时尽可能保留关键文化词汇的异质性。这一策略组合印证了韦努蒂关于归化与异化共存于一个连续统的论述，说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应在“可理解性”与“文化异质性”之间按词汇的功能定位逐类权衡[14]。

4.2. 句式结构的转换分析

汉语与英语在句法结构上的差异，是散文英译中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连淑能在《英汉对比研究》中系统阐述了英汉两种语言在语法特征、修辞手段、表现方法、文体风格等方面的系统差异[13]。汉语是“主题凸显”的语言，句子结构的组织往往以话题为中心；而英语是“主语凸显”的语言，要求每个句子必须有明确的主语和完整的语法结构。这一根本差异决定了汉译英必须对原文的句式结构进行系统重组。《我与地坛》大量使用无主句、问句与主被动颠倒句式，这些句法特征不仅是语言的表层形式，更是作者哲思方式和情感节奏的直接体现；句式结构的转换本质上是一种文体资源的再分配[16]。

4.2.1. 主题凸显到主语凸显的转换

原文开篇第一句即体现了汉语主题凸显的句法特征：

原文：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

译文：The Temple of Earth wasn't far from my home, or perhaps it's better to say my home wasn't far from it [17].

原文通过两次陈述的相互补充和微妙修正，营造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感。译文准确地保留了这一修辞策略，先以“The Temple of Earth”为主语，再以“my home”为主语，通过主语的对调来实现原文的修辞效果；同时，译者必须为每个分句补全主语和谓语，这是英语句法的强制性要求。这一案例印证了英汉“主题凸显”与“主语凸显”的系统差异：句式结构的强制重组若运用得当，可以在不损失语义的前提下保留原文的修辞效果；从文体学的角度看，主语的选择本身即承载着视角与情感[16]。

4.2.2. 无主句的处理

《我与地坛》中大量的无主句是翻译中的难点。汉语的无主句往往具有独特的审美效果——隐含的主语使读者自然地将自己代入其中。例如“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一句，“一个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主语，而是话题。译文采用“it was easy for a person to see time”的句式[17]，通过形式主语“it”和不定式结构，将原文的话题–评论结构转换为英语规范的主谓结构。这一“增补主语”的处理印证了文体学关于句法形式承载意义的观点：增补主语是保障语义完整的必要手段，但其代价是原文话题–评论结构特有的顿挫感有所弱化[16]。

4.2.3. 问句的翻译与哲思效果的传达

《我与地坛》的问句发挥着重要的哲学叩问功能，翻译中如何保留其深层功能是译者面临的重要挑战。

原文：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译文：After thinking like this for several years, I finally figured things out: Being born isn't something for a person to debate: it's simply a fact that's handed over to him by God. In handing over this fact, God has also seen to its conclusion; so death is something that need not be done hastily: death is an inevitable festival [17].

这段翻译体现了译者对原文哲学气质的高度敏感。“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译为“death is something that need not be done hastily”，准确地传达了“不必急”的从容态度；“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译为“death is an inevitable festival”，将“节日”直译为“festival”，保留了史铁生用词的独特性与“节日”一词既庄重又温暖的双重意味。整段译文节奏沉稳、长短交错，成功再现了史铁生哲思语言的独特气质。这一案例从正面印证了文学文体学的基本命题：句式节奏本身就是哲思的载体[16]；将“节日”直译为“festival”，也说明保留陌生化表达是再现哲思语言的有效途径，与异化策略“保留差异”的主张相呼应[14]。

4.3. 意象系统的传递

《我与地坛》构建了一个丰富的意象系统。地坛既是实体的物理空间，也是作者精神的栖居之地和生命哲学的展开场域；园中的老柏树、野草、昆虫、落日、雪，都具有超越具体物象的哲学意蕴。

4.3.1. “地坛”作为核心意象的多重内涵

译者在翻译中采取了前后一致的处理方式，将“地坛”统一译为“the Temple of Earth”(或“the Temple of Earth Park”)，确保了核心意象在全文中的连贯性。地坛译名在全文中的前后一致，体现了译者在意象层面贯彻异化策略的自觉：核心文化意象一经确立，便以稳定的能指贯穿全文，这印证了异化策略在长

篇文本中维系文化连续性的价值[14]。

更重要的是，译者在处理与地坛相关的空间描写时，注意保留原文的空间感和方位感。例如，“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中，译者准确地传达了空间的移动轨迹和逐渐靠近的趋势，这种空间感的保留对传达作者与地坛之间近乎“宿命”的牵连感至关重要。

4.3.2. 景物意象的翻译与诗意再现

以第一段中关于“时间”和“太阳”的描写为例：

原文：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译文：At that time, the sun—following its immutable course—was growing larger and also redder. In the serene light pervading the park, it was easy for a person to see time—and to see his own figure [17].

“亘古不变的路途”译为“its immutable course”，准确地传达了太阳运行的永恒性；“沉静光芒”译为“serene light”，用“serene”一词同时传达了“沉静”和“安详”的双重意蕴；“看到时间”直译为“see time”，这是一个高度诗意的表达——在常识中，时间是不可“看”的，但史铁生正是要用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达来传达面对地坛落日时的直觉体悟。译者没有将“看到时间”归化为“feel the passage of time”之类更“合理”的表达，而是保留了原文的诗性语言。将“看到时间”直译为“see time”，是译本中异化策略最精彩的实践之一：它印证了异化策略对源语表达方式的尊重能够转化为译文的诗意与张力[14]。

4.3.3. 意象翻译的归化与异化倾向

总体来看，译本在意象翻译上呈现出“以异化为主、适度归化”的倾向：对于核心意象、自然意象和具有特定文化意涵的意象，译者倾向于保留原文的能指形式，让英语读者直接面对这些陌生的意象。译本在意象层面的“以异化为主”与在词汇层面的“归化为主”形成了有趣的分层组合，丰富了对归化与异化策略组合方式的认识：两种策略并非只能整体二选一，而是可以在不同语言层次上分别配置[14]。

4.4. 语言风格的再现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的语言风格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是朴素自然的口语化表达，另一方面是凝练深沉的哲思语言，两种风格的交替构成了全文独特的美学面貌。

4.4.1. 哲思语言的英译效果

在哲思段落的翻译中，译者展现出了出色的语言驾驭能力。以关于生死的段落为例，译文句式长短交错、节奏沉稳、用词精准，在英语中再现了史铁生特有的哲学语气。再如：

原文：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

译文：After reaching this conclusion, I felt much better; nothing in front of my eyes seemed so terrifying any longer [17].

“安心多了”译为“felt much better”，简洁朴素；“不再那么可怕”译为“seemed so terrifying any longer”，用“seemed”一词暗示了视角的转换——并非世界本身改变了，而是看待世界的方式改变了。这一案例表明，哲思语言之所以得到较好保留，正是因为译者把握了其文体标记——沉稳的句长节奏、判断式的陈述语气——并逐项在英语中找到了对应资源，这正是文学文体学所倡导的分析路径[16]。

4.4.2. 口语化风格的消解及其原因

然而，在口语化表达的翻译中，译本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书面化”倾向。史铁生的散文语言大量吸

收口语元素，使其既有哲思的深度，又有娓娓道来的亲切感。但译文在处理这些口语化表达时，往往选择了更为规范的书面表达。例如，原文中反复出现的“呢”“了”“吧”等语气词在译文中几乎没有对应表达；“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这句带有口语化修正语气的表达，在译文中变成了“or perhaps it’s better to say”，虽然语义准确，但失去了口语即兴修正的自然感。从文体学的视角看，语气词与口语修正语正是口语化风格的“风格标记”，这些标记在译文中的缺席，使译文在语义等值的同时发生了文体层面的“假象等值”式流失[16]。

这种口语化风格的消解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英语文学散文的传统规范更为“书面化”，与汉语散文兼容口语的特点不同；其二，中外合作翻译的模式可能导致译者在语言风格上倾向于“安全”的选择，以语法正确、表达规范的书面语为准；其三，译者作为学者型译者的身份，可能使其天然倾向于更为典雅规范的表达。

4.4.3. 译者风格的显现

葛凯伦、陈泽平译本的整体风格可以概括为：规范、准确、流畅，在文化负载词和哲思语言的翻译上表现出色，在句式节奏和口语风格的再现上则有所折损。这种风格与两位译者深厚的学术背景、中外合作模式确保的语言地道性以及归化为主的整体策略取向密切相关。归化策略保障了译文的流畅，也在一定程度上以目标语规范消弭了原文的口语风格差异[14]；风格再现的折损提示译者需要建立更自觉的文体意识[16]。

5. 译本的整体评价与翻译启示

5.1. 译本的成功之处

葛凯伦、陈泽平译本的成功首先体现在文化负载词的精准处理上。译者充分发挥了其专业优势，对“地坛”“琉璃”“朱红”“祭坛”等文化词汇的处理既准确又自然；尤其在哲思类词汇的翻译上，译者成功地找到了中英文化之间的概念对接口，使史铁生的生命哲学能够为英语读者所理解。译文中的哲学段落读起来既保持了原文的深沉节奏，又符合英语哲学散文的表达习惯，可以说达到了理想的传达效果。

其次，译本的流畅性和可读性值得充分肯定。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使译文读起来自然流畅，读者几乎感受不到翻译的痕迹。葛凯伦作为英语母语者的语言直觉，加上陈泽平对中文原文的精准把握，使译本找到了“信”与“达”之间的较好平衡。

5.2. 译本的不足之处

首先，译本的主要不足体现在语言风格再现的不均衡上。译文在传达哲思语言方面表现出色，但在再现原文口语化风格和朴素质感方面存在明显弱化，朴素与深邃交织的独特质感有一定程度的流失。

其次，长句结构的分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原文节奏韵味的传递。史铁生绵延不绝的长句营造出的意识流动感和时间流逝感是原文美学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英语句法的限制虽使长句的分割不可避免，但节奏层面的审美效果仍有所折损。

最后，某些文化负载词的归化处理可能过于追求“可理解性”，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文化异质性。例如将“宿命”译为具有基督教色彩的“foreordained”，虽然提高了可读性，却给原文添加了一层西方宗教文化的滤镜。从韦努蒂的理论看，这正是归化策略的典型代价：译文越流畅，源语文化的差异越容易被消弭[14]。

5.3. 对散文翻译实践与研究的启示

葛凯伦、陈泽平译本为中国当代散文英译提供了以下启示。

第一，在句法层面，对于哲思语言宜采用“直译保留陌生化表达”的策略。前文 4.2.3 与 4.3.2 的案例表明，译者将“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直译为“death is an inevitable festival”、将“看到时间”直译为“see time”，以略感陌生的表达保留了原文诗性语言的张力。这提示译者：哲思段落的翻译不必处处迁就英语的惯用搭配，在语义可解的前提下，保留非常规表达是传达哲理深度的有效手段。

第二，在口语化风格的处理上，本译本的不足提示译者需要建立系统的补偿意识。原文中反复出现的“呢”“了”“吧”等语气词、口语化的即兴修正以及大量无主句，在译文中或被省略、或被规范化为完整的书面句式，导致娓娓道来的亲切感有所流失。为弥补这一损失，译者可以在英语中调动相应的口语资源：以短句与并列结构模拟汉语短促的节奏；以“you”或“one”作泛指主语保留代入感；以破折号、插入语和缩略形式再现口语即兴修正的语气；以句末情态动词或感叹句式补偿原文的舒缓语气。

第三，综合而言，对于史铁生这样兼具哲理深度与口语质感的文本，译者宜采取“句法保哲思、词汇补口语”的双轨策略：在句法层，保留哲思段落的长句、判断句式与陌生化表达，以维持思想的凝重感；在词汇层，为口语化表达选用英语的日常语域词汇与口语性句法结构，避免以正式书面语“净化”原文的质朴。前文 4.4.2 的正反案例表明，这一策略的落实需要译者先建立原文的风格标记清单(语气词、口语修正语、句长节奏、主被动句式)，再逐项在英语中寻找对应的文体资源，而非笼统地追求“通顺”“规范”。

第四，这一策略同时重新定义了归化与异化的关系：文化负载词层面可适度异化以保留文化特质(如“地坛”直译并辅以说明)，语体风格层面则宜适度归化以保留口语的亲切感——即“异化保文化、归化保语感”。二者并非简单的二选一，而是可以在不同的文体层次上并行运作。

6. 结语

葛凯伦和陈泽平合作翻译的《我与地坛》英译本，是中国当代散文英译中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案例。本文从文化负载词、句式结构、意象系统和语言风格四个维度对该译本进行了系统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译本采取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实现了准确性与可读性的良好平衡。在句式结构的转换上，译本体现出汉语“主题凸显”向英语“主语凸显”的系统重组，既保障语法规范又保留了原文的语义与修辞效果。在意象系统的传递上，译本以异化为主，保留了地坛意象系统的核心要素。在语言风格的再现上，译本成功地传达了原文的哲思气质，但口语化风格的转译存在一定程度的消解。

译本的整体评价可以概括为：准确、规范、流畅，哲思传达出色，风格再现略有折损，其成功经验与不足都为中国当代散文英译提供了宝贵参照。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进一步显示：如何在翻译中平衡语义准确性与风格完整性、归化与异化能否在不同文体层次上分别配置、中外合作翻译模式如何影响译文面貌，都有待后续研究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 史铁生. 我与地坛[J]. 上海文学, 1991(1): 37-44.

[2] 陈思和.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340-342.

[3] 黄培清. 中华文化“走出去”背景下散文英译探微——基于翻译写作学的视角[J]. 武夷学院学报, 2024, 43(4): 54-60.

[4] 景治强, 张雪琪. 《我与地坛》维译本明喻的翻译技巧[J]. 品位·经典, 2021(11): 21-27+159.

[5] 罗浩. 《我与地坛》翻译的实践报告[D]: [硕士学位论文].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14.

[6] 赵勇. 《我与地坛》面面观[J]. 名作欣赏, 2011(22): 5-17, 2.
[7] 屈伟忠. 《我与地坛》的文学语言形式及其意蕴[J]. 中学语文教学, 2023(8): 46-49.
[8] 张曦凤, 张家威. 中国现代散文英译压缩策略研究[J]. 翻译研究与教学, 2023(1): 93-99.
[9]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0] 乔彩霞, 张凌. 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的散文汉译研究[J]. 鸡西大学学报, 2014(12): 105-108.
[11] 杨宏坤, 王显志. 从变译理论视角探析散文英译[J].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4): 102-106.
[12] 穆琼, 马群英. 刘宓庆翻译美学视域下《散文佳作 108 篇》汉译英分析[J]. 汉字文化, 2021(20): 142-144.
[13] 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4.
[14]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15] 省译协举办第五期翻译系列讲座[EB/OL]. 2024-01-19. http://wb.fj.gov.cn/zwgk/gzdt/zwyw/202401/t20240119_6383643.htm, 2026-10-09.
[16] 申丹. 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17] Gernant, K. and Chen, Z. (2010) Eleven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Turnrow Books.